

逢先知

回顾毛泽东关于防
止和平演变的论述

中央文献出版社

78792

284-1
DG 19/16

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 和平演变的论述

逢先知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回顧毛澤東關於防止
和平演變的論述**

HUIGU MAOZEDONG GUANYU FANGZHI

HEPING YANBIAN DE LUN SHU

逢先知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850×1168mm 32開 1印張 13,000字

300,001—400,000冊

1990年12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4次印刷

ISBN 7-5073-0064-1/D·16 定價 0.45元

出版说明

这篇文章，原载《真理的追求》一九九〇年创刊号，出版这本小册子时，作者又作了补充和修改。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在我国发生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以及这一年秋冬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动荡，回顾一下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思想，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从50年代末期起，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犯有“左”的错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结论。这一《决议》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一《决议》的指导下，对毛泽东从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一些思想作具体分析：对于其确实是错误的，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对于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应当继承、借鉴；对于一些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则要加以分析，吸收其正确的部分，剔除其错误的部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论述，就是应当很好地加以研究和学习的问題。

一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问题

当美国的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

演变战略，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抓住这个问题，首先是向党内的高级干部，尔后又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们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根据现在查到的材料，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1959年11月，那是在他召开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他印发了杜勒斯的几篇演说，内容都是讲和平演变的，要大家看一看。他说：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还特别讲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并提出应当采取的一系列的实际步骤。大家都知道，他在1964年6月16日的讲话，就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从这次讲话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向着不同的对象，他又多次讲这个问题。他警告人们说：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

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到现在已过去整整30年了。尽管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曾经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党内外形势,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发展中的许多正常现象也误认为和平演变,但是我们在纠正这些错误的时候决不能忘记,和平演变的危险始终是客观存在着的;去年的政治风波最有力地证明,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这个关系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是很有远见的。

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当帝国主义者动用武力打败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遭到失败的时候,他们就改变策略,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达到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实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渗透,用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影响青年一代,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和培植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即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的人,以及那些反对派。他们特别注意在共产党内部寻找他们的这样的代理人。应当看到,国际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就不会停止,企图最终实现其消灭社会主义的美梦。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在思想上也绝对不能含糊。我

国在今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条件下，对于和平演变的危险需要更加警惕。还要看到，当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的情况下，他们除了采用经济制裁手段，对我国施加压力以外，还会日益加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任何情况下，矢志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过时。同过去一样，最终支配资本主义国家的仍然是垄断资本、金融寡头。二次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原来是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实行资本输出、经济压榨这样一个根本状况，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失。还应当看到，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为非和平的、暴力的形式。因此，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会运用和平的与非和平的两手，对付他们反社会主义的两手。

在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就社会制度来说，它们既是对立的，又是共存的。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共存，对双方都有有利的一面，是双方的需要，这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遵循和平共处原则的客观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客观依据。我们既不能因为和平共处而丧失对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也不能由于帝国主义灭亡社会主

义之心不死而拒绝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更不能因此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

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是长期的历史任务，是几代人的任务。我们应当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同时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 关于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 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首先应当说明，在60年代，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时候，他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估计是错误的，他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也是含糊不清的。他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作修正主义，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搞乱了思想。但是，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往往把修正主义同资本主义看作是一回事，例如他说：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在1964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得更明白，他说：“什么叫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尽管当时毛泽东所使用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资产阶

级思想概念的含义也含糊不清，但是，从根本原则上说，他把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险，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来，不能不说是很有预见的。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能否得逞，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否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毛泽东 60 年代的预见，在 80 年代末被证明了。正如毛泽东所强调指出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965 年 8 月的一次谈话）鉴于国际国内的教训，现在党中央特别强调，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从中央到地方，必须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个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问题。毛泽东历来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从 1944 年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全党学习，引以为戒，到 1949 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到解放初期发动“三反”运动，都是为了防止和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所以，在 50 年代，我们国家政风比较清廉，社会风气也比较好。人民对这一点是满意的。60 年代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个运动错误地打击了党的许多好的

和比较好的干部；但是它对于防止干部的腐败现象，对于纠正干部脱离群众现象，也起了一定作用。毛泽东一贯坚持不懈地同党内的腐败现象，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同这些丑恶现象是不相容的。毛泽东这方面的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是坚强的，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行正确的政策，党的自身又是健全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那末，我们党就能顶住来自任何方面的敌对势力加给我们的压力和腐蚀，防止和平演变，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党不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健全自身的肌体、消除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那末，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就必定利用我们党的弱点，利用群众的不满和失望，煽动制造动乱，以达到颠覆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一定要牢牢记取。

三 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问题

中国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结果。自由化思潮从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就已露端倪，同时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从那以后，在这10年中间，虽

然邓小平同志多次提醒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由于党的个别主要领导人未能坚持实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对自由化思潮制止、斗争不力，表现软弱退让，甚至纵容和支持，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最后终于导致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新的历史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我们要维护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占领思想舆论阵地。同样，那些搞自由化的人，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也是拼命企图占领思想舆论阵地，为他们的夺权阴谋做准备。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总是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大造舆论，宣传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也特别重视从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渗透。

这里有一个怎样正确处理学术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把它们加以区别，生拉硬扯地把学术理论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用强制的方法对待学术理论问题，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党过去在这方面犯过严重的错

误，不应当重犯。因为，这样不但有害于甚至会扼杀理论学术的发展，而且有害于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同样，如果看不到某些学术理论问题涉及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放任不管，任凭错误的、有害的学术观点自由泛滥，也是完全错误的。有些看来似乎是学术理论性质的问题，但如果在这些方面任凭资产阶级观点泛滥，那就会起腐蚀作用，逐步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要正确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是一件比较困难而复杂的工作，绝不能简单化。毛泽东主张在学术上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也主张对错误思想进行正确的批评。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如何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仍是需要我们党在实践中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解决好的一个重大政策问题。他又说：“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

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以上引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现在重温这些论述，是有益的。

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关于怎样对待“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通过百家争鸣，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另一种态度是自由化的态度，他们也抓“百家争鸣”方针的旗帜，大作文章，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宣传自由化的观点，来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又提出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在今天，六条标准，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这两条，仍然是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可是，在一个时期，六条标准成为一些人集中攻击的目标，说它们会扼杀学术理论的发展，束缚人们的思想等

等。这正是自由化的观点，需要加以澄清。1960年10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斯诺说：西方报纸有许多说法，说“双百”方针政策在1957年开始执行时，是因为你们认为党的威信已经很巩固了，不会有什么反对的人，但运动开展后，很快就发现有许多人反对你们，因此你们就把这个运动停止了。毛泽东回答说：你说的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你说我们停止百花齐放，事实上我们并未停止。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我们从开始就是这样的，不是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齐放”。毛泽东在这里是说得很清楚的。

在讲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错误。50年代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有其积极的一面，例如，对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但是这种批判，在做法上，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从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倾向到60年代更为严重了。在1964年前后，他把建国以来我党领导下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美术等方面的工作成绩几乎全盘否定，对一些无害的，甚至是优秀的作品以及文艺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使文化界人人自危。这种批判后来又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在这些领域也形成草木皆兵的气氛。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一定要避免重演，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吸取过去的教训是为了让马克思

主义合理地占领思想阵地，而不是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思想阵地，对意识形态的工作放任不管，纵容真正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自由泛滥。我们应当把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作为工作的前提，明确承认意识形态战线的斗争是党的总任务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把他关于意识形态问题论述中一切对的、好的、合理的东西吸收下来，剔除其错误的部分，用以指导我们今天这方面的工作。

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状况怎样？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诸矛盾中占有什么地位？阶级分析的方法还灵不灵？这些都涉及马列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涉及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问题。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几乎用主要的精力，根据中国的实践，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走过曲折的道路。他在这个问题上，既有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又有严重的失误，导致人为的阶级斗争，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加以冷静的分析，既要对其中错误的东西引为鉴

戒，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又要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作为指导我们前进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研究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状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的内容主要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指出，要好好地认识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会走向反面，即走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夺取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特别强调要教育青年。他说：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困难，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要靠老一辈的人把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1963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在经历了去年我国发生的政治动乱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动荡之后，再来重温毛泽东的这些话，使人感到十分亲切。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大部分范围内居于统治地位，在一个长时期内这种情况还不会改变，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较弱小，因此，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不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不能放松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而且还将证明，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是正确的。尽管他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使用过一些很不适当的提法，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